

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著，《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林玉菁譯，臺北：時報出版社，2023年，455頁。

美國漢學研究一般將中國東南沿岸的移民納入「海外華人」研究框架，探討自清帝國統治時期以來，特別是19世紀以降，這些移民如何在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的影響下，參與歐洲殖民資本主義在東南亞的勞動與經濟過程。另一種理解移民的方式則源自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國市鎮研究，該研究以區域分析為基礎，將東南亞(海外)華人視為一個整體。然而，這些移民是否真能視為單一整體呢？他們的經濟發展動力究竟源自何處呢？

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繼1998年出版博士論文(*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後，在2021年出版新作《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麥氏從關注法律史，轉為全球海洋史。本書以潮州移民為研究對象，聚焦於福建與廣東之外的群體，並提出核心問題：「來自這處(潮州)又小又窮且難以統治的這個位於中華帝國一角邊陲，貧困且難以治理的地方居民，如何搖身一變，崛起成為20世紀的南海的商業霸主？」(頁12)

本書分為兩部分，包含10個章節。作者依據歷史發展的時間序列，將第一至第四章歸為第一部分，探討「潮州海域」的生成(1767—1891年)；第五至第九章則構成第二部分，分析該海域的衰落(1858—1929年)及其與全球經濟大恐慌的關聯性。

本書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作者在華人研究方法論上有新的突破，重新反思「邊陲—中心」的概念。相較於過去研究將中國東南沿岸的移民視為一個同質整體，作者選擇將潮州移民置於全球史的脈絡中加以探討，延續了美國漢學界「新社會史學」與「大歷史中的小人物」的研究傳統。然而，作者亦突破施堅雅的區域研究框架，採用「跨國尺度」(頁14)的視角，分析單一歷史事件在不同區域間的連鎖效應，從而重新詮釋1767至1929年間南海地區的歷史發展。此種視角不僅突破單一國家、村落或商港的研究侷限，也使讀者得以觀察人群在不同區域之間的流動及其影響，進而挑戰「邊陲」與「中心」的定義。

其次，本書探討海域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重新界定中華帝國、華人群體與殖民勢力之間的連結。作者依據對南海不同稱謂的使用方式，將該區域區分為兩個層次：一為潮州人活動的「潮州海域」，另一為明清帝國治理的「海疆」。最後，作者探討潮州人在東南亞的社群是否可被視為一種殖民形式，進而挑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論(頁16)。

在第一章，作者以「海的恩惠與詛咒」為題，探討海洋如何形塑潮州人的雙重特質。一方面，潮州海岸每年受到颱風與暴雨侵襲，洪水泛濫後往往導致土地重新劃分。明、清兩朝儘管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差異，但是皆反對東南沿海移民從事對外商業貿易，並透過強制性軍事行動干預沿海地區秩序。此類政策使當地居民在環境變遷、戰爭與國家政策的多重壓力下，成為「難民」，同時促成沿海地區械鬥文化的興起，進而導致鄉村軍事化，並衍生出幫會與跨區域新興宗教。另一方面，潮州人亦因地理位置而發展出精湛的航海技術，以及憑藉靈活的商業策略，在「商人」與「海盜」雙重身分之間取得微妙平衡。

第二章則探討潮州移民「逃離中國」後，在東南亞的經濟與政治活動。他們支持暹羅統治者鄭昭及其貴族，不僅在暹羅灣沿岸形成潮州經濟圈，亦擴展至越南、婆羅洲與新加坡等地，建立經濟據點。這些移民長期參與走私與鴉片貿易，不僅促成18世紀幫會組織的形成，也深刻影響近現代中國史與歐洲史的發展，進而推動鴉片資本主義的興起。

在第四與第五章中，作者以方耀的清鄉事件作為實證個案，將地方事件視為跨國分析的單位。因此，這兩章的時間跨度是從1869年至1970年。方耀的清鄉行動展現了清帝國對地方的政策與意識形態，在驅逐所謂的「罪犯」的同時，也促使潮州人逃離中國。這項行動不僅加速潮州地區社會階層的分化，將農工轉化為苦力，進而促成兩個主要階層的出現：商人與苦力。這一連串的變化帶來了跨時間與跨地域的影響，成為本書最精彩的分析之一。作者分析了大量逃離中國的罪犯與幫會成員如何影響海峽殖民地的社會秩序。隨着移民的湧入，當地犯罪率直線上升，英國殖民當局因此選擇與馬來人合作，成立保護英國利益的跨國警力部隊，禁止幫會成立，並重新塑造南海地區的社會秩序。1905年，潮州海域連結起孫逸仙的革命運動，以及長期存在的階級對立，進一步促成1920年中國共產黨在此地的崛起，導致潮州人再度逃離中國。部分潮州人選擇在柬埔寨開設雜貨商店，並與當地村民共生，這一社會互動模式亦影響了1970年的「紅色高棉」事件，潮州移民在柬埔寨政府對華人社群的血腥鎮壓中受到波及。

第二個案例則涵蓋第六與第七章，討論潮州商人在長江下游與上海的活動。這不僅回應了彭慕蘭的「大分流」論點，也挑戰了傳統「衝擊—回應模式」的解釋框架。本書的案例也呈現了潮州人如何影響19世紀亞洲（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商業貿易網絡，並在與歐洲殖民體制的互動中，既合作又競爭。作者將敘事時間回溯至鴉片戰爭（1860年）期間，探討清帝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並透過潮州人與英國人在鴉片貿易中的分工與競爭，揭示華人作為亞洲境內貿易的主要中介者的角色。表面上，英國似乎掌控了鴉片與其他商品的生產與銷售市場，實際上，潮州人在海峽殖民地掌握了商品的分配、開發莊園、礦業等特權，成為實質的經濟控制者。不論是潮州人還是在上海活動的「潮陽幫」，都在一定程度上邊緣化了英國人在鴉片貿易中的角色。儘管中國政府將「鴉片貿易」與「走私」視為不道德的經濟行為，甚至視之為叛國行為，潮州人仍利用行銷鴉片的龐大利潤，於1916年中國政府禁止印度鴉片後，轉向銀行金融、房地產、電影等多元產業發展，並投入資源於潮州地區的公共基礎建設。

第八章反思了過去關於移民跨國家庭的研究框架。孔復禮(Philip Kuhn)以「通道」概念建構移民的流動路徑，並將移民的落腳地描述為「生態棲位」。他認為，華人為了確保通道的暢通與降低風險，會將家庭成員分散於不同地點，形成跨地域的家庭紐帶。然而，麥柯麗不僅關注潮州或移民男性的經歷，也深入探討女性的雙重角色，並分析她們在中國東南沿岸與海外的不同境遇。潮州沿岸的女性，在面對家庭男性長期缺席（因移民或清鄉事件死亡）的情況下，成為家庭經濟與政治的主導者；而海外的女性則從事跨國性產業，展現潮州人及東南沿岸居民獨特的生存策略。這種視角不同於傳統華人研究中僅討論男性移民的單一視野。（孔復禮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2019，臺北：聯經出版社，頁76—80）

最後，作者試圖挑戰「歐洲與亞洲發展動力來自何方？」這一史學有界爭議的話題。彭慕蘭在「大分流」的觀點中認為歐洲與亞洲的中國及日本在19世紀都具備工業化的條件。但為什麼最後是西歐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彭氏以上海為例，認為兩者的差距在於他們面對生態災難及資源減少的應對措施。歐洲，尤其是英國，面對環境災害與資源減少後仍有突破性的作為。中國卻因為沒有殖民，導致帝國內部的資源受到耗盡。（彭慕蘭著，黃中憲譯，《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臺北：衛城出版，2019）作者在第六與第七章回應彭慕蘭的觀點，指出上海與殖民地，並不是單純由歐洲殖民者（英國）主導經濟與社會關係。潮州人

外移到東南亞，形成華人的社群與經濟活動等同於在經濟與社會面向與歐洲殖民體制「匯流」。(頁17)他們在面對生態災難時也展現韌性。此韌性為潮州人透過鴉片貿易，以「民間」力量參與重建原鄉社會的力量。

作者認為潮州人雖然在東南亞沒有土地權，但透過歐洲殖民者保護其經濟利益，仍實際參與歐洲殖民體制之中，並「掠奪」當地的經濟資源。他認為潮州人的殖民形式與歐洲會由國家支持不同。此特殊性可比擬為中國「土地租佃制度」：一田兩主。(頁384)但他認為潮州人在東南亞殖民與中國政府(無論是清帝國或中華民國)都無直接關係。因為前者既沒有受國家支持，且地方在面臨災害時都是仰賴外地的商人支持。因此，作者認為中國(亞洲)經濟發展的動力源自於中國東南沿岸的移民。對此也是作者試圖回應近年南海局勢的主要論點。

本書在全球史視角下，重新定位上海、香港與東南亞的區域關係，挑戰傳統漢學界對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動力的解釋。雖然2019年孔復禮已有專著討論中國東南沿岸移民的全球史發展，但是麥柯麗的研究更進一步結合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邊疆」概念以及李塔娜(Tana Li)的「海疆」論點，翻轉傳統「中心—邊陲」的敘事。然而，本書仍有商榷之處。

首先，作者對潮州範圍的界定不夠明確。例如，在第二章中，作者將婆羅洲的淘金者與嘉應州客家人全納入「大潮州地區」(頁92)。此做法雖然應證出漂亮的人群動態圖像，但同時有混淆研究主體的疑慮。這也讓讀者在閱讀完後，不禁想進一步詢問，究竟什麼是潮州人呢？另外一項則是在第六與第七章中，作者精彩的推論潮州人如何將英國邊緣於鴉片貿易的過程，強化潮州人的能動性，忽略歐洲殖民體制的角色。這也反映在作者過度聚焦於潮州人與國家(清帝國、中華民國與歐洲殖民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卻忽略其他群體的身影。

此外，作者在解釋歷史事件時，偶有過度推論之嫌，例如新加坡暴動事件直接歸因於方耀的清鄉行動(頁187)，儘管後面他援引其他事件(拿律戰爭，Larut War)，試圖緩和前面的因果關係，以避免過於直斷。(頁190)但筆者仍認為作者僅有統計資料為論證力較微弱之外，也未能充分考量當地歷史脈絡。最後，筆者認為綜合以上的特色，本書仍是為東南亞華人研究提供新方法與視角的重要著作。

郭曜軒

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